

## 自序

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個人們不斷記憶的「過去」，也是我二十多年中一再重訪和書寫的「現在」。本書便記錄了我不斷的努力，但並非簡單地把多年的研究原樣聚合，因新材料的發現及年齒日增帶來的感悟，也以新的面貌加入其中。大部分文字收於此前簡體字版的《激情年代：五四再認識》，此次除了全面校訂，第一章作了大幅修改，並新增了第四章和基本重寫的第十二章。本擬寫一篇〈繁體版序〉，惟舊序本稍倉促，近年也略有新知，乃拆開重寫，以補此前言有未盡之處。

百多年來，許多人為五四樹碑立傳，其形象已更清晰，卻也依然如霧中之月，微茫而朦朧。有些專門研究「五四」（以下非特指不加引號）的學人未必同意這樣的見解，然而對於在歷史上實際出現的五四，我們的瞭解確已足夠深入、充分了嗎？以「見之於行事」的標準，隨意進入一個具體的「行事」，答案或未必樂觀。至於那豐富多元的整體五四，恐怕仍需置於歷史長河與世界格局中繼續體味，以獲取陳寅恪所說的「瞭解之同情」。<sup>1</sup>

---

1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1930年），見《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279-280頁。

## 依然朦朧的五四

五四運動向有廣狹兩義：從字面義言，五四特指1919年那次以學生為主的運動；然而通常說到五四，大約都會往前後各推移幾年，是所謂「廣義的五四運動」（略近於通常所說的「新文化運動」）。兩種五四不僅運動時間長短不同，就連其象徵性的口號也各異。一般視為五四基本理念的「民主」與「科學」，更多適用於廣義的五四；而當年遊行的學生口裏所喊的，卻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一類口號；兩者間實有一段不短的距離。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大家都以1919年的學生運動作為一個整體的象徵，每逢「週年」就發表紀念的言論；另一方面，很多人心目中的五四運動其實是廣義的。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從2015年開始，學界便開始出現一些以「百年」為題的「回望」、「反思」文字，甚至有一些冠以「百年」的相關研討會召開。真正到五四學生運動百週年時，各類紀念活動所涉及的內容，也遠超過狹義的學生運動（以下說五四，凡不特別註明，皆廣義的。惟用以斷時的「五四後」和「後五四」，則多為狹義的）。

隨着時間的積累，兩種五四的並用已經約定俗成。從研究者到媒體，大家都共同使用含義各異的概念，而不覺其間的衝突。這反襯出一個我們可能注意不多卻實際存在的事實，即「五四」的內容和意涵本來相當豐富，它的形象原本就不那麼「一元化」。如今一些人已在思考怎樣繼承「五四遺產」甚或是否應當跳出「五四的光環」，其實不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五四，不僅未到蓋棺論定的程度，甚至一些基本史事都還沒搞清楚，仍處於一個言人人殊的狀態。

歷史上有些事件和運動是因為材料不足徵而不容易弄清楚，五四則不然，相關史料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確有一些面相由於史料不充足，不得不借助想像予以推論（因此而多有爭議）。然而也還有一些材料尚足的面相，長期被研究者視而不見，處於一種存而不論的狀態。

且舉一例。梁啟超曾說，要「瞭解整個的中國，非以分區敘述為基礎不可」。<sup>2</sup>即以狹義的五四運動論，也不僅發生在一地。當年北京的學生運動多少有些偶然，儘管有很多當事人的回憶，但究竟是哪些人實際領導了學生的運動，以及當天遊行路途上發生了什麼事，迄今尚存爭議。連北京市區的運動過程都還不夠清楚，遑論各地的運動了。蔣夢麟在五四當年就反覆說及「從北京到廣東，從上海到四川」，<sup>3</sup>但廣東和四川的五四，我們現在知道多少？儘管已有一些記述地方的資料集，然使用者實不算多（我自己就很少用）。<sup>4</sup>各省的五四運動，基本仍不清楚。若所謂縣鄉鎮層級，受到關注就更少了。<sup>5</sup>

五四的內容和意涵本來相當豐富，區域因素以外的其他方面，沒弄清楚的具體內容也還不少，仍需繼續探索。而五四的一大特點，是幾乎當場就成了不能忘記的「歷史」。對五四的詮釋和解讀，起步相當早，幾乎和學生運動同時。故關於五四的言說，從一開始就與本事纏繞在一起，難以區分。既存的相關研究增進了我們的認識，然經過長時期各種

- 
- 2 梁啟超：〈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並目錄〉（1922年），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27頁。
  - 3 蔣夢麟：〈這是菌的生長呢還是筍的生長呢〉，載《晨報·週年紀念增刊》，1919年12月1日，1-2版。
  - 4 例如與五四學生運動關聯最密切的山東，雖有胡汶本、田克深編的《五四運動在山東資料選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書出版，但研究論著的數量和品質，尚不夠令人滿意。
  - 5 近年區域的五四研究已有人關注，陳以愛的《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香港：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據說是她「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的第一本。鄉鎮方面也有一些新探索，參見徐佳貴：〈「五四」與「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溫州地方知識人及刊物為視角〉，《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瞿駿：〈覓路的小鎮青年——錢穆與五四運動再探〉，《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按小地方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運動的影響，在一些地方，可能看不到五四的直接影響，如鄭振滿從大量「地方文獻」的閱讀中，就幾乎看不到五四的存在（鄭振滿：〈日常生活中的文字傳統〉，「樂道人文講座」第10講，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23年4月24日），但也不排除未表現在文字上的間接影響。

取向的解讀，在一些面相愈來愈清晰的同時，也不排除被詮釋者增添了一些「作霧自迷」<sup>6</sup>的成分，增添了後人索解的難度。

## 認識複調的五四

據說老子曾對孔子說：「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這是《莊子·天運》中所言，義甚悠遠。如果「履之所出」乃履跡而非履，而昔人之陳跡未必是其「所以跡」，則西方文論所謂文本一經產生，即具有了脫離母體（即作者）的獨立生命，似亦可由此索解。章學誠早就注意到，文本一經寫定，解讀就變化多端——「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sup>7</sup>

在某種程度上，五四的歷史和歷史敘述中的五四，就像一個涵義豐富的文本，早已被歷來的眾多解讀者「千百其意」了。熟讀老莊的魯迅曾主張：「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只主張聽者心裏明白所聽的是說夢。」<sup>8</sup>

依魯迅的意思，不顧文本作者及其產生的語境而就文本論文本的「說夢」取向，是可以存在的；但聽者（即文本詮釋的受眾）需要區分並明瞭「說夢」與「說事」兩種取向的不同。若取上述文學批評理論解讀五四，最好能指明其所解讀出的，乃是作為「獨立文本」的五四之意涵，而非與「作者」及其時空關聯的那個五四；或將兩者進行區分，讓「聽者心裏明白」他們所聽的是「說夢」還是「說事」。

---

6 熊十力語，見熊十力：《讀經示要》（1944年），《熊十力全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卷，840、874頁。

7 章學誠：《文史通義·朱陸》，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56頁。

8 魯迅：〈「題未定」草七〉，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6卷，430頁。

如果選擇了「說夢」取向，在解讀時是就已「獨立」的文本進行詮釋，或不宜將其解讀還贈文本的作者，指出某某主張如何、某某贊同和反對什麼，等等。不幸的是，一些持「說夢」取向的五四研究者，卻未能遵循其所借鑒的理論，常將其想像力豐富的解讀，還贈五四的當事人，使我們認知中的五四形象更加撲朔迷離。

重要的是，文本不論有多獨立，仍有其產生的母體。從時間視角看，其實也可以說，文本一產生，就已經是過去式，也就成為歷史了。與其相關的語境，自然同樣是歷史的。不論是就文本解讀文本，還是將文本置於其產生的語境中解讀，恐怕都不能不考慮歷時性的因素。且五四時代的中國，本就是一個複合的時空。正是多重時空因緣的疊加，使五四呈現出複調的面貌。

過去受梁啟超影響，常說中國對外國的認識有從器物、制度到文化的三階段進展，而討論史事也多沿着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一系列事件的時序模式。其實五四學生運動本因外來刺激而起，那時的歐戰，特別是新俄的出現，使時人的思想受到強有力的外來衝擊，他們對中國現狀和歷史的反省以及對未來的憧憬，包括五四人常掛在口上的覺醒、解放和再造，基本都在一個時空縱橫的框架之中，早已超越了線性的時間進程。我們觀察五四，最好依循時人的思緒，以觀時而觀空，並以觀空而觀時。<sup>9</sup>

杜亞泉曾提出一個以特定時段的「時勢」來劃分新舊的主張，而這個時段又以標誌性事件來確定。由於「時勢」在變遷之中，所以新舊不是固定的，而是相對的。不同時段之新舊，意義並不相同。既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相互否定。<sup>10</sup> 這樣一種據事件以定時段，又以時勢分新舊的見解，便多少帶有以觀時而觀空的意味。

---

9 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囑語跋〉，見《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64頁。

10 參見杜亞泉：〈新舊思想之折衷〉，見周月峰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杜亞泉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498-499頁。

徐志摩描述的擲石子入深潭的音響效果，給我們以進一步的啟示：「拿一塊石子擲入山壑內的深潭裏，你聽那音響又清切又諧和。餘音還在山壑裏迴蕩着，使你想見那石塊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無底的深潭。」<sup>11</sup> 試想若在餘音仍迴蕩時再擲入一塊石子，便會出現兩次回音的繚繞；水中看不見的先後兩塊石子還在慢慢沉落，而水面可以聞知的餘音卻已難辨彼此。

同樣的情形也表現在石塊激起的漣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子所激起之漣漪還在蕩漾，而後下的石子又激起新的漣漪。石塊雖有先後，兩次漣漪在視覺上卻是連接的，不排除前次的漣漪被一些人視為是新石子所造成，反之亦然。且觸岸之鱗波還可借力反蕩，與襲來的新波互動重疊（overlap）。這樣一種波動不息的繁複層次雖是歷時性的，表現出來卻往往像是共時性的，因而也常被認知為共時性的。

歷史上那些帶有「禮失求諸野」意味的現象，借此可以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在中心區域已形成新的「禮」，而邊緣區域舊禮的餘波仍在，故可尋覓舊禮的履跡。然而中心區域的新禮也會逐漸向邊緣區域延伸，當地出現的履跡不排除為新禮的衝擊所致，卻可能被看成舊禮的餘波。尤其人之所見往往是他們想要看到的，對那些懷抱「禮失求諸野」願望的觀察者，即使真是新禮的履跡，也很容易被視為舊禮的餘蔭。

在實際的歷史中，落水的石子可能不止兩三次，那些像是共時性的音波或漣漪，可能是歷時性的不同因素所造成。倘若石塊進入的是流水而非靜水，本有水聲和波鄰在，這就牽涉到外來衝擊的反應與內在既存理路之間的緊張，石子造成的音波和漣漪也因此而更複雜難辨。<sup>12</sup>

---

11 徐志摩：〈濟慈的夜鶯歌〉（1924年），見趙遐秋等編：《徐志摩全集》，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卷，148-149頁。

12 石入流水承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徐君玉提示，謹此致謝！

具體到五四，由支流匯聚而成的五四波濤，奔湧所至，必有回波，而各不相同（例如其流經上海，便與在成都激起的漣漪未必一樣）。<sup>13</sup>像這樣歷史上相當特殊的事件，不僅當時的本事和言說，包括事後不絕如縷的後見之明，都在聲聲相應，形成一個互為因緣的複調樂章。故石子入水這樣一種「衝擊—反應」，既是啟示也是挑戰，要辨析那些音波或漣漪的成因，亦即履跡的「所以跡」，雖極不容易，又不得不為。

戴維斯 (Natalie Z. Davis) 論新舊史學的差別說，舊史家希望得到「以直白而一目了然的言辭」建立起來的絕對真相，而新史家「處處看見複雜和多歧的現象」，在努力尋求「確切的真相」時，也願意先接受某種「可能的真相」。<sup>14</sup>五四本是一個「多層多面的運動，有其複雜性」。<sup>15</sup>既然史事本身是豐富的，所謂歷史書寫表現出的五四就不必顯得太「整潔」和「凝練」。如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所說：「能一目了然的東西並不存在。我們對中國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離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實性也就越近。」<sup>16</sup>這一睿智的提醒，特別適合於對五四的認知和表現，我們確實需要看到一個複調的五四。

## 本書的內容

五四運動是民初激變時代中的一個里程碑事件。我其實從很早開始就準備寫一本關於五四的專書，也曾擬出了大致的章節，很多都已有

13 此承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月峰老師提示，謹此致謝！

14 Natalie Z. Davis, "On the Lam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 3 (June 1988), p. 574.

15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見《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200頁。

16 史景遷：〈16世紀後期至今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收入羅溥洛 (Paul S. Ropp) 編，包偉民、陳曉燕譯：《美國學者論中國文化》，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15頁。



半稿或資料長編。惟因隨順世緣，<sup>17</sup>不少內容不得不先後寫成論文刊發，那書稿只能擱下了。由於已刊發的文字收入不同的文集中，不易形成聚合的認識。於是將版權已到期的各論集中與五四相關的文字拆出來合在一起，<sup>18</sup>加上新寫的數篇通論性文字，成為《激情年代：五四再認識》一書，<sup>19</sup>現又增訂為繁體字版，希望能有稍更集中的呈現。

第一章是引論，提出把「天下」的視角帶回歷史敘述。近代一大變局就是天下的崩散，向外轉化出了世界與中國，向內轉化出了「國家」與「社會」。五四運動發生時，身在中國現場的杜威 (John Dewey) 看到「國家」的誕生，而當事人傅斯年則看見「社會」的出現。這樣不同的即時認知充分表現出五四蘊涵的豐富，也告訴我們「國家」與「社會」這兩大外來名相的意涵尚在形成之中。而這些五四人物自己都不甚清楚的名相，又成為觀察、認識、理解和詮釋五四的概念工具，既表現出「早熟」的意味，也遮蔽了當時出現的一些非國家和超國家的思路。由於「國家」的詮釋力有限，故有必要把「天下」的視角帶回歷史敘述，以增進我們對五四運動及其所在時代的理解和認識。

第二章相對宏觀地檢視五四的體相與個性，強調五四運動是一個「會合的歷史運動」，有其中心主旨和統整的體相。先從相對宏觀的視角觀察辛亥革命與五四的關聯，以探索後者究竟是外來衝擊的反應還是自我的覺醒。並考察民初新舊之爭怎樣發展為向「文化」開戰，一體兩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壞與建設，以及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相

---

17 五四永遠是熱點，每逢週年，總有約稿。而有些約稿，特別是長輩的命題作文，是無法拒絕的。

18 其中最後一章來自《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那本書的修訂版已刪除此文），兩章來自《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那本書不會再版，書中其他內容也會分別納入其他文集），更多的來自《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那本書會重編，側重相對宏觀的論述，而討論具體人物、事件的都會轉入他書）。

19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



互影響，進而從後五四時代的認知去檢視新文化運動的遺產，可以看出五四已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標識。

第三章從五四的認知歷程廣續探討五四的體相與個性，側重其時代特性。從五四的下限北伐開始，「五四」認知漸趨定型。然而關於五四形象的歷史協商，仍在進行之中（迄今亦然）。把五四放在歷史脈絡中，更容易看到其時代性，瞭解它在中國近代史上表現的更多是延續還是突破。同時，自具體相的五四，又顯出與整個近代大趨勢不同的特異性。這種雙重的時代特性增強了認識五四的難度，卻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們需要正視五四那多元複雜而感情洋溢的時代特色，充分認識五四的外在整體個性和內在的多歧個性，注意觀空與觀時的互動，以複調的取向來研究五四的人和事。

第四章進一步申論五四的複調特性，強調五四運動是一個從發生當時就開始被傳頌、記憶和詮釋的特殊事件。運動本身並非謀定而後動，而是在發展中完型。在其逐漸定型的過程中，本事與言說的糾纏，是一個與生俱來而又從不離棄的現象。五四運動當然有其不約而同、眾皆呼應的主題，然也確實頭緒紛紜。史事本身的多姿多彩，導致了五四認知的多樣化。它就是一個複調的運動，其內部不同的聲音既各自獨立，又共同參與並形塑出一個更大的和聲。變化的史事需要發展的理解，豐富的史事需要多元的理解。既要表現出時代的「公言」，也當再現各種獨特的「私言」，以複調的方式表述複調的史事。

第二至四章提示出一個共同問題，即五四運動究竟是不是一個可成一統的自足體系。從表面看，狹義的五四因其時間短而且訴求明確，似更顯自足。然而學生運動實際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進程之中，其對整個運動的「改寫」是清晰可見的。胡適愛說學生運動時瞬間湧現出四百多種支持呼應的白話刊物，<sup>20</sup>更揭示出廣狹兩義五四的內在關聯——沒有此

---

20 胡適：〈五四運動紀念〉（1928年5月），見《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卷，368頁；〈報業的真精神〉（1953年），見《胡適全集》，第20卷，701-702頁。

前新文學、新思潮的滋養和培育，驟發的學生運動恐怕不會在當時就「一呼百應」，並在此後持續得到呼應，<sup>21</sup>以一個政治為主的運動在歷史上留下顯著的文化烙印。

我們常說時勢造英雄，其實英雄也可以造時勢，廣義的五四就最能表現時勢與英雄（知識青年）的相互塑造。若狹義五四抽離出來自成一統，不僅自身立足不穩，更會大大淡化整體五四的歷史存在和歷史意義。可以說，不論廣義狹義，五四都不是一個真正自足的體系，卻也在發展中漸成一統。大體在五四時代結束之時，一個同質性的「五四」認知，已在約定俗成中逐漸成型，故五四確有自具其相的一面。但五四又是一個甫發生就被記憶和詮釋的運動，其含義長期持續發酵。人們記憶中的五四，在不同的時段和場域，表現出隱顯不一的選擇性，其構建一直在繼續。這樣一種多少有些自足又始終處於發展之中的情態，正類前述潭中相互盪蕩之漣漪，粗看已渾成一體，細觀則層次隱約可見。

前四章差可算作通論，第五至十二章是各論，大體以時間為序，由內到外。首先從社會視角看文學革命。當年影響甚廣的文學革命，是廣義五四的開端。而據當事人胡適晚年的看法，文學革命「這一運動時常被誤解了」。他所說的誤解，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般對文學革命的成功一面，似乎都有偏高的評估，卻又不怎麼言及其真正劃時代的長遠結果——全民改用白話文。文學革命的先驅在向着「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個取向發展的同時，已伏下與許多「一般人」疏離的趨向。可以說那是一場精英氣十足的上層革命，故其效應正在知識精英和想上升到精英的邊緣知識人中間。

過去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多體現其抗議和反抗的一面。其實沒有什麼重大政治變革的五四前一年，對許多時人來說曾經充滿了希

---

21 呼應的程度容有不同，然而即使是慨嘆對五四的冷漠甚或想要跳出五四「光環」的呼籲，都表現出五四在歷史記憶中抹不去的影響。

望：既有「公理戰勝」的樂觀，也有對「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學生參與校外活動受到鼓勵，大型歡慶活動至少在方式上為學生運動進行了預備。當時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現出特別明顯的內外纏結特點，不少人以為人類新紀元從此開始，希望借歐洲戰勝的東風，由外及內，一舉解決中國的全部問題，進入世界大同境界。巴黎和會與南北和會代表着以會談方式解決困局的嘗試，兩者的失敗預示着思想和行為方式上和緩取向的艱難。正因希望和失望都來得有些意外，舉國的失落感強化了士人心態的激進。

從學生運動前夕讀書人心態與政治的關聯，可以看到從文學革命到後來的思想論爭以及政治走向的脈絡，而「問題與主義」之爭恰是一個代表性的事件。那次爭論為時不長，卻觸及到一些時代關注的焦點，反映出五四時期各種流派混雜難分、陣線混淆的重要特徵。當年包括安福系在內的朝野各方都以為「社會」的革命或改良不可避免，這樣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輿論界」一邊希望有所「區分」，以確立自身的特性。簡言之，那時的中國思想界遠比我們認知的更為豐富而活躍。

有些後來以為衝突的觀念，對當時當地的當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樣對立，反有相通之處。例如，中國社會改造是局部解決還是整體解決的問題，就是一個時代關注的焦點，它所涉及的面相，遠比既存研究所述的更為寬廣。當時傾向於整體或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人相當普遍，其中不少人甚至不那麼激進；而在主張根本解決的人中間，也未必都贊同馬克思主義。對於相當一部分人而言，整體或局部解決兩種取向並非勢不兩立，反可能是一種互補的關係；且「根本解決」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另一個時代關注的焦點，則是外來主義與中國國情的關係問題。其中既有讀書人在學理方面的探討，也有革命黨人實踐中的困擾和因應。爭論各方都承認中西社會的歧異，並從世界角度思考中國問題的解決。需要注意的是，胡適主張輸入外來「主義」應當考慮適合中國的國

情，這一觀念在中共黨人探索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問題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應。基本上，胡適和李大釗關於「問題和主義」的言論在一段時間裏共同成為年輕一輩的思想資源，提示着這一爭論未必像後來認知的那樣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論述的程度。

五四時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在後期出現了明顯的轉向。這與其創始人陳獨秀的思想轉變密切相關，而其直接的誘因，則是陳獨秀不再繼續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此事既與校外的新舊之爭相關聯，也涉及校內的大學體制構建，以及與辦學取向異同相關的人事之爭。陳獨秀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移，及其主張的談政治與《新青年》側重思想的既定方針之間的緊張，都需要進一步的考察。與思想傾向關係不大的經費問題，反可能是促使刊物與中共聯繫起來的一個實際考量因素。重新探討《新青年》轉向的因緣脈絡，揭示出五四遠比我們所認知的要更多姿多彩。

從老師輩對學生運動的即時觀察和事後反思看，「學生」這一近代新教育的社會成果日漸脫穎而出，體現出群體的自覺，並被賦予救國救民的重任，卻也越來越疏離於教育和學術本身。救國和讀書怎樣兩全，成為擺在師生兩輩人面前的重要問題，而兩代人的認知卻不盡相同。漸被視為社會模範的學生其實缺乏自制能力，這個充滿內在張力的現象，始為老師輩所提醒，繼而困擾着躊躇滿志的學生群體本身，與時俱存，揮之難去。

五四人的特點是放眼世界，而文化的區域性和世界性是後五四時代一個敏感而微妙的問題，所見人各不一。時人明知東方和西方並未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卻慣以它們來表述世界，提示出特定的時代關懷；而對此提出反對的質疑者，其實也有各不相同的具體針對性。儘管如此，時人卻可以在缺乏共識的基礎上進行相互分享的探討。後人不宜忽視當年那些似可不言而喻的歧異認知，或不妨從彷彿可以不計的「小異」之中，探索其間的「大不同」。

對於五四的基本理念，如德先生和賽先生，後五四人曾有認真的省思。北伐後的民主與獨裁之爭是對德先生的反省，而此前的科學與人生觀之爭則是對賽先生的反思。張君勱在1923年一次帶偶然性的講話，究竟在何處以及怎樣挑戰了新文化人關於「科學」的基本觀念，從而使後者不得不拔劍而起？通過考察分析「科學」觀念在後五四時期的演變，可以反觀五四人心目中的「賽先生」究竟何義。過去有些研究者對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水平感到失望，其實論戰當事人之所欲言，與這些失望者之所欲觀未必一致。時人對於「科學」及「科學方法」有着相當不同甚至帶本質區別的理解，許多研究者經常使用的「科學主義」這樣一個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術語，對發生在中國五四後期的一次具體爭論，可能沒有多大的詮釋能力。

本書始於把「天下」帶回歷史敘述的主張，而當年的中國讀書人的確嘗試過把天下的政治模式嵌入現代國家。1922年胡適曾提出「好政府主義」，不久更出現了一個為時短暫的「好人政府」。這個看似歷史插曲的努力，正是這一取向的嘗試。好人政府背後的「賢人政治」，大體是一個適應天下時代的傳統理念；好政府主義強調政府應積極作為，又更適應現代的國家時代；而時人面對的北京政府，恰是一個具有現代形式卻又延續傳統小政府理念的政權。那是一個政治倫理轉換的時代，在新禮衝擊下，舊禮顯已勢弱，卻仍暗生波瀾。雖不無迴光返照的意味，「天下」並未離開歷史現場。新舊政治倫理的糾結，容易使人感覺無所適從，卻也留下更寬廣的嘗試空間。各種充滿張力的取向如何關聯互動，是個需要重新講述的故事。<sup>22</sup>

伴隨着政治倫理的轉換，五四人對政治本身及其與文化的關係也有過深思。這一根本性的思慮，涉及到何種方式更能改善中國的現狀以及

---

22 說詳羅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國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嘗試〉，《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一度曾想疏離於政治的胡適最終走向接受政治解決的取向，經歷了充滿無奈的掙扎，或也可以說是與時代協商 (negotiations) 的結果。從五卅運動到北伐，中國逐漸進入一個「行動時代」：個人讓位於群體，政治壓倒了文化。言說的無力揭示出讀書的「無用」，宣告了一個以文化為表徵的時代真正成為歷史。

## 五四活在我們血脈中<sup>23</sup>

在學人的實際操作中，每項具體研究，大都是截取一段史事來進行探索。這種切片式的研究或是不得不為，但在認識、解讀和分析被截取的具體片斷時，卻不能看作是靜態的，而當注意梁啟超所說的，「每一段史蹟，殆皆在前進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態」。<sup>24</sup> 只有注重單一史事那「若行若止」的動態及其與他人他事的時空關聯，才可能領會並表現出其靜中有動的精神風貌。

所謂「歷史長河」本是流動的，時而波瀾壯闊，時而細水緩流，甚或成為泛着微瀾的「死水」。<sup>25</sup> 有石入水，激流與靜水的漣漪不同，淺溪與深潭的音波也各異。流經五四那個激情年代的歷史長河，整體或如洶湧澎湃的奔流，而不太像靜止的深潭。但若切到具體的水面，其漣漪、音波，也不過程度之差。如劉咸忻所指出的，「凡靜定，皆自一渾同中裁節而後見」。<sup>26</sup> 任何一個片斷都是周流變動中截取的一靜定，且必截取而後可見、可考察分析；但此所謂「靜」仍在動中，乃是變動之中「不行

23 清華大學歷史系的李欣然對本節的修改提出了建設性意見，謹致謝忱！

24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111頁。

25 此借用李劫人小說的書名。

26 劉咸忻：《呂氏春秋發微》（1930年），見《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96年影印，第2冊，1138頁。

不止」的靜定，<sup>27</sup>或即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辯證的靜止」，<sup>28</sup>現象雖似凝固，仍可透視到動的姿態。

不僅史事片段需要放在更大的流動歷史背景中考察，對歷史全域的認識，也因截取的片段不同，而獲得不一樣的認知。換言之，每個史事片段不止是整體歷史的一個部分，它也可以折射出歷史整體本身。如余英時師所說，對不同的人，五四就像「月映萬川」那樣因人而異，「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若要對五四「求得更深的理解」，也需要見之於人人。<sup>29</sup>

萬川映月，亦類石入水中，川不同則音波、漣漪也各異。尤其歷史是要見之於行事的，每個人在具體場域的所思所言所行，永遠是重要的。面對在時空中演變的五四，每個當事人、事後人和研究者，都有自己身臨其境的具體認知，人各不同。一個個獨立又彼此因應的聲部構成了複調的樂章，這樂章又被一次次地演奏和詮釋。五四的體相並非將各單一節點簡約串連起來，而自有其統整的一面。然單一的認知既是五四整體形象的一部分，又與其他眾多認知相伴相生、互為因緣；更因是置身其中的具體感知，有着不可替代的獨特性。

這對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蓋個性有時是偏於感性的。在表述的技術層面，史學的处理需要盡可能平靜。不過顧頡剛也曾主張，為了讓讀者瞭解「各時代的特殊色彩」，作者遇到「抽象的史料，也必得有生動的敘述」，才能使讀者「眉飛色舞」。<sup>30</sup>「生動的敘述」實非易事，只能作為努力的目標。為保存事物的「特殊色彩」，我們至少可以遵循文

27 《莊子·天下》：「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28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by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62–463.

29 余英時：〈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見《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74頁。

30 顧頡剛：〈中學校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法的商榷〉，《教育雜誌》，第14卷，第4號（1922年4月），11頁（文頁）。



如其事的取向，尊重時代、事件和人物的個性，使展現出來的五四不一定那麼「鎮靜」，那麼理性，尤其不那麼整齊劃一。

本書各章撰寫的時間相差二十多年（1996–2020），寫作機緣不一，也並不系統，甚至不妨說是零散的碎片。然而所謂碎片正是個性的體現，也是體相的構築者。這些碎片之間並無清晰的邊界，也少見明顯的斷裂，反呈現出密切的關聯，即都在表現讀書人為尋求國家出路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上下求索，彰顯五四這一時段的豐富和多樣化，希望能呈現出一個複調的五四。

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在區分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時提出，自然過程中的「過去」一旦被「現在」所替代，就可以說消逝了；而歷史過程中的「過去」則不同，「只要它在歷史上是已知的，就存活在現在之中」。正是歷史思維使「歷史的過去」成為「一種活着的過去」。因此，不能被後人認知和重新思考的，便等於尚未進入歷史過程。<sup>31</sup>那些思考怎樣繼承「五四遺產」或是否跳出「五四光環」的人，或許有些類似柯林武德之所言，側重的是在我們心中能夠重新思考的那個五四。

而蒙思明看法稍不同，他以為，「歷史本身的演變，一氣相承，川流不息」。一件事有無史料保存，只影響我們的歷史知識，卻無關於歷史本身。故史料消亡，或不被記憶、認知，既不意味着史無其事，也不能說該事件「對於我們當前的生活與思想就無影響」。<sup>32</sup>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睿見，從這個視角看，我們的生命中其實融匯了無數過去的生命，而歷史本就意味着過去的生命融入了我們的生命。即使在歷史言說中

---

31 這是柯林武德所謂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學理基礎，但他並非「以不知為不有」（傅斯年語），而是主張努力去認知那些尚未被認知的部分。參見R.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pp. 225–226, 218–219. 此書有中譯本，見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256、248頁。

32 蒙思明：〈歷史研究的對象〉，《華文月刊》，第1卷，第6期（1942年11月），15頁。

「不知」(或在歷史記憶中一度隱去)的「過去」,也依然影響着「我們當前的生活與思想」。

何況五四還是一個人們不斷記憶的「過去」。它所置身的歷史長河,雖可達「萬川」之多,卻如蒙思明所說,一氣相承而川流不息。已成歷史的五四,不論我們對其已知多少,就像一切歷史那樣,早已活在我們的血脈之中。從這個角度言,五四給我們的影響,恐怕是招之未未來,揮之難以去的。

作為歷史的五四,仍有很多基本史事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和更深入的認識。瞭解五四,也有助於我們認識自己。在那些歷史記憶中曾經隱去或為人所「不知」的五四面相進入我們的歷史言說,成為我們心中可以重新思考的「歷史事實」之後,不僅我們認知中的五四與過去不一樣,我們的「生活與思想」也可能有所不同。

## 鳴謝

與我很多專題論文稍不同,本書更偏重於敘事,雖然仍是一種分析的敘述,稍近於壓縮的「通論」。各章在寫作時,於開頭結尾處或多或少都曾言及五四的總義。這次重組為一個整體(儘管仍然鬆散),此類說法基本都已刪略,適當整合入相關的章節。個別章節有所擴充,一些章節的文字有所修訂,包括整段整節的文字移易,期能稍更連貫。最後一章因為一些「新材料」的出現,做了較大幅度的改動,可以說是重寫的。

書中參考和所使用的一些資料,承海內外眾多師友(尤其是不少年輕朋友)熱情指點和幫助,甚至代為查核、影印,謹此一並致謝,也要感謝《近代史研究》、《社會科學研究》、《天津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戰線》和《清華大學學報》各刊惠允將曾經發表於該刊的拙文收入本書。

民初白話初興時，不少常用字詞與今日不同，如用「狠」來表述今日「很」的意思，用「譚」表述「談」的意思，用「(計)畫」表述「(計)劃」的意思，用「甚麼」表述「什麼」的意思，用「智識」表述「知識」的意思，還有不少人使用「底」來表述今日「的」和「地」的意思。對這類字詞，在指意明確且不影響文意的情況下，引文中均改為「很」、「談」、「劃」、「什麼」、「知識」和「的」、「地」，以利當今讀者。另外，對近現代史料、文集標點本中的一些標點，亦偶有更易。其責任在我，請勿視為編校錯誤。

下面兩段話已多次出現在拙作的序言之中，仍願重複一遍：

本書倘幸有所得，都建立在繼承、借鑒和發展既存研究的基礎之上。由於現行圖書發行方式使窮盡已刊研究成果成為一件非常困難之事，對相關题目的既存論著，個人雖已盡力搜求，難保不無闕漏。同時，因論著多而參閱時間不一，有時看了別人的文章著作，實受影響而自以為是已出者，恐亦難免。故在向既存研究的作者致謝之同時，我願意申明：凡屬觀點相近相同，而別處有論著先提及者，其「專利」自屬發表在前者，均請視為個人學術規範不嚴，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註明，請讀者和同人見諒。

儘管各文尚不成熟，恐怕會有辱師教，但我仍願意在此衷心感謝成都地質學院子弟小學、成都五中(烈五中學)、四川大學、新墨西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各位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以及這些年來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師。他們在我修業問學的各個階段中都曾給我以熱誠的關懷和第一流的教誨，在我畢業之後繼續為我師表，誨我不倦，這或許是我比一些同輩學人更為幸運之處吧！本書若幸有所獲，悉來自各師的教導。當然，所有謬誤之處，皆由我個人負責。

2019年8月16日

於青城山鶴鳴山莊

2023年8月9日

改寫於江安花園